

中东剧变与国际连锁动荡周期*

杨勉

(中国传媒大学政法学院,北京 100024)

摘要:卡扎菲之死标志中东动乱翻开了新的一页。这场阿拉伯之春是一场由信息愤青掀起的反叛运动。其传播效应突出地说明,利用信息手段动员起来的动乱和造反,组织是无形的,发生是瞬间的,规模是巨大的,结构是平面的,领导是隐形的。在消除了东方对西方的挑战后,阻碍发达国家政治经济制度彻底全球化的主要障碍,主要来自一些发展中国家。改造南方成为美国和欧盟为主体的北方国家集团的主要战略目标,而南方国家中的伊斯兰国家首当其冲。21世纪初期,国际形势复杂多变,自然生态和人类社会面临双重动荡,经济、政治与自然危机接踵而至。仅以20世纪来看,经济连锁性动荡10年一次,政治连锁性动荡20年一次。世界将逐步进入新一轮的解构和建构时期,冷和平局面将会逐步破局,热冷战可能会逐步升级。

关键词:中东风暴;阿拉伯之春;国际连锁动乱周期;冷和平;热冷战

中图分类号:D81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869(2012)02-0076-06

2011注定成为了阿拉伯年,一场多米诺骨牌倒塌式的风暴席卷了地中海南岸。现在,本·阿里流亡沙特,穆巴拉克被送上法庭公审,卡扎菲被俘后又虐待致死萨利赫在三次食言后最终交出总统权印,叙利亚动乱继续发酵,中东——北非连锁动乱正未有穷期……

一、信息时代的知识愤青造反

阿拉伯之春本质上是一场知识愤青掀起的信息青年反叛运动。青春期发泄和冲动同网络 and 手机无缝对接,形成巨大的动荡气场。阿拉伯广场风暴,抗议的主力军都是年轻人。“愤怒日”就是愤青的造反日。高出生率的阿拉伯国家,人口的一半都是青年。25岁以下人群在也门、沙特、约旦、摩洛哥和埃及占到人口的近50%,而在中东其他地区,25岁以下的占到总人口的37%—47%。“青年人口膨胀”问题加上经济不景气,造成这些国家青年大都是“没有工作、没有钱、没有老婆”^[1]的三无青年。阿拉伯国家青年失业率平均维持在20%—25%,甚至在一些阿拉伯国家青年中失业率达到55%。而有工作的青年则干着薪水最为低廉的工作。青春期中

最想发泄和最易冲动的年龄。毕业即失业,当青年人的愤懑变为绝望时,火药桶引爆的日子就不远了。

与半个世纪前纳赛尔革命时期的阿拉伯青年大部分是文盲,没使用过电话不同,对21世纪的阿拉伯世界来讲,青年生存环境的最大反差是受过高等教育,但没有工作;普遍上网冲浪和使用手机,但没有公开发言权和话语权。“‘知识和权力之间的分离’可能‘会使政治系统处于紧张状态’。”^[2]80后90后的最大特点就是成长背景是信息社会,这与50后相比是质的变化。强人政府的舆论控制迫使知识青年把心中的不满宣泄到了网络上,网络成为“社会情绪的宣泄口”。此次风暴的始作俑者突尼斯为例,1100万突尼斯人口中,“仅‘脸谱’网(Facebook)用户就达200万(全国人口的1/5)”^[2],网络和手机导致“自焚事件”迅速变成了全国乃至地区性和国际性的大事件。信息技术与知识愤青无缝对接,使网络和手机成为这场运动隐形的领导,无形的组织者。高技术平台帮助不满情绪聚集,形成巨大的动荡气场。“茉莉花革命”有“第一场数字革命”之称。^[2]旧式的威权监控方式在应对信息新技术和80后90后方面明显落伍。

* 收稿日期:2012-03-01

作者简介:杨勉(1955-),男,北京人,硕士,中国传媒大学政法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主要从事国际关系研究。

“这一代人比他们的父辈接受了更好的教育，掌握了更多的资讯拥有现代通讯手段，能相互连接成为网络群体，而不需要参与什么政党。”^[1]此次阿拉伯风暴突出地说明，利用信息手段动员起来的动乱和造反，组织是无形的，发生是瞬间的，规模是巨大的，结构是平面的，领导是隐形的。知识愤青与信息技术的结合，是21世纪世界各国社会维稳面临的新问题。80后90后是信息的一代，原有的社会控制方式正在没落，必须有新的方法和技术，才能应对新形势的挑战。这不仅仅是对发展中国家，而且对发达国家也是一样的，前不久爆发的英国伦敦青年骚乱和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都印证了这一点。

二、大风之后必有大浪是因果铁律

俗话说，大风之后必有大浪，世界经济危机从2007年底爆发以后，世界各国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和国际协调。危机被迅速压下去了。表面上没有一个国家为此垮台。北方许多人认为，危机就这样过去了，华尔街还在萧条阶段，就高喊着要复苏了。其实，没有一次经济危机是可以这样过去的，这是因果铁律。让世界经济面临“第二次探底”的欧美债务危机，近来汹涌而至，说明西方经济仍处在萧条阶段。

每次危机总是要有埋单者和殉葬者。此次阿拉伯世界的大动荡，实际上就是2008年经济危机负面影响后期发酵的结果，“动荡的本质根源依然是金融危机，非洲国家大多是小经济体，扛危机能力弱，金融危机从欧洲传染到北非，引发政治动荡。”^[3]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一个接一个成为经济危机祭坛上的最新牺牲品，包括石油富国在内的整个阿拉伯国家经济，受危机后萧条的影响，呈衰退状。“中东国家本身吸纳和消化失业人口的能力较弱，特别是这些国家正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恢复缓慢，发展也比其他地区显得滞后。”^[1]社会大多数人都产生了向下滑的担心，再加上严重的贫富不均。

三、威权需要定期刷新形式和丰富内容

最先发生剧变的阿拉伯国家都不是最穷的国家。“单从经济指标看，已经垮台的突尼斯和埃及，其经济业绩在阿拉伯国家中并不算差：突尼斯经济竞争力非洲第一，幸福指数世界第29位；埃及2008年被评为“全球最佳改革国家”之一，在178个国家中列第26位”^[4]，“利比亚和巴林人均GDP均超过一万美元，国内民众福利水平也不错。”^[4]实践证

明，当发展水平和收入水平进入中等程度时的威权主义国家，最容易爆发争民主和求人权的运动，这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中产阶级和知识青年对权力垄断和资源分配不公更为敏感。中产阶级的独立性和法理性天然不认知一人专政和少数人垄断，主张社会资源按公开有序的游戏规则来竞逐和分配。

毫无疑问，大部分阿拉伯国家的发展水平确实不具备实行欧美式民主的条件，这也将在这场风暴后的日子里不断表现出来。但是，这不能成为阿拉伯世界统治者永远照旧统治下去的理由。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说的，世界没有亘古不变的事务，只有不断地改革，才会充满生机和活力。经济发展程度与政治体制形式应该相辅相成，与时俱进。阿拉伯国家政权的统治结构几十年一贯制，明显已不适应中东地区发展阶段的要求，二三十年一成不变的领导人，审美也疲劳了。阿拉伯世界的强人领袖在位时间都超过了审美的正常界限。所以“废除职务终身制”是这次风暴的最初目标，人们首先要求的就是“XXX总统下台”。本·阿里在位23年，穆巴拉克执政29年，卡扎菲掌权41年，萨利赫在位32年，阿萨德父子世袭40年……更不要说那些代代世袭的沙漠酋长和国王家族：沙特、巴林、阿曼、科威特、卡塔尔、阿联酋、约旦、摩洛哥……“阿拉伯政权或依靠领袖威权，或依靠传统制度，其政治制度虽然也进行一定的微调，但在本质上已很难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进而失去了合法性，并在当前成为民众抗议浪潮试图颠覆的对象。”^[5]

最高职务终身制、政治血统世袭制、经济家族垄断制、个人崇拜阿谀制，集世界专制体制特征于一体的阿拉伯权贵们以为只要有滚滚而来的石油美元制造的“天方夜谭”，就可以避免臣民造反，但是却不懂得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道理，对于那些人均GDP几万美元以上，七星饭店和八星饭店不断涌现，本国人基本不再从事体力劳动的某些阿拉伯石油富国，如此富裕和发达的社会，却连国会、宪法、政党、选举、女权这些最起码的民主形式都没有。须知，人们的精神与政治参与要求不会永远与其生活的物质环境相分离。特别是，今天的80后90后愤青与其从沙漠草原牧羊人直接成为富翁的父辈们远远不同了。

即便是那些领导反帝反殖的民族英雄，其统治的合法性也不是可以永远透支消费下去的。适合不适合实行直接民主是一回事，而把国情需要威权管

理,当作自己和家族垄断权力以牟取私利的挡箭牌,就无法阻止人们以自由民主为旗号动员推翻你。靠长达几十年的“紧急状态”来控制国家,无论如何都不是正常的管理状态,它本身就成为导致人们不满的催化剂。

“从表面看,当前中东国家面临的危机错综复杂,乱象丛生,但政治合法性的危机无疑是中东阿拉伯国家陷入群体性动荡的重要根源。通俗地讲,所谓政治合法性就是国家政权及其统治的正当性问题,即国家政权的权力来源与分配以及政治架构不仅要有充分的正当性,还必须得到国民的效忠与忠诚,进而获得社会心理层面的广泛认同。根据韦伯的理论,合法性首先表现为政治体系的客观正当性,主要包括习惯的正当性和法律的正当性。”^[5]

尽管政治体制发展可以滞后经济发展进程是一般规律,但政经发展不同步的时间差不是可以人为无限拉长的。政治体制的革新如同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一样,需要每过一段上一个台阶,刷新形式和更新内容。长期的威权政治和老人政治都使国家的政治体制陷入僵化,多数国家普遍面临领导人的继承危机。尤其是在威权的共和制国家,政治领袖完成民族独立与解放的政治光环日渐黯淡,民众已日渐丧失了对现行体制的信心。当前中东的抗议浪潮也正是民众长期绝望情绪以及变革求新渴望的剧烈宣泄。^[5]历史已经证明:再好的体制也要防止僵化固化。经济高速发展的威权主义国家,在政权有较高威信时,及时进行渐进式的政治体制改革,无疑是保障可持续掌权的明智选择。前不久,新加坡前铁腕领袖李光耀宣布辞去“内阁资政”职务,实际上是意识到上述问题而采取的应对措施。

四、大乱之后可能会有分离

历史经验表明,大动荡之后会有分离。一战、二战、冷战结束都伴随着国家分离浪潮和帝国解体,这次也可能出现。阿拉伯风暴将成为中东和非洲分离主义的新给力。“自20多年前因苏东剧变冲击而发生一轮大动荡之后,非洲还没有出现过像今年这样密集的动荡事件。”“非洲问题集中爆发明显受到突尼斯和埃及革命的示范效应影响。”^[3]

南苏丹已经宣布独立。阿拉伯世界还存在着西撒哈拉、库尔德、南也门、索马里兰等独立运动,此外,利比亚的东、西部、南部之间,沙特的东、西部之间、阿曼的东、西部之间、阿尔及利亚的南、北部之间、毛里塔尼亚的南、北部之间、北苏丹与达尔富尔

之间,阿联酋各酋长国之间、都存在着地区、教派和民族的嫌隙;还有临近阿拉伯的乍得、尼日尔、马里等黑非洲国家,与苏丹有着极为相似的问题背景。在持续战乱与对峙的背景下,其中一些内部矛盾最终向分离方向转变并非没有可能。

五、北方强行改造南方的战争

21世纪的人类已步入信息时代,这是一个与工业文明有着本质区别的时代。后冷战时期,围绕民族分离权、宗教复兴权、民主选举权、话语表达权、国家发展权、文明多样权等诸多权利展开斗争,世界对立双方的时代博弈建立在“文明冲突”、“民主与人权”与“和平发展权”的理论基础之上。这是北方文明与南方文明同化与反同化的斗争,是发达国家强迫改造和教化发展中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捍卫自我发展权利的斗争,是物质发展与生态平衡的斗争,也是数字鸿沟带来的“信息富有者”与“信息贫困者”的斗争。

冷战后的世界格局实际是两强伴一超的单极世界。北方国家以美国为首,欧洲和日本为副。无论是冷战时期的西方联盟还是反恐战争期间的北方联盟,其成员的分歧和矛盾都没有超出战术分歧和家庭矛盾的性质,这与瓜分世界的殖民时代是不同的。全球化时代改变了发达国家间关系的性质。冷战时代西方国家面临着社会制度被东方国家彻底推翻的现实危险,联合的凝聚力是以共同利益为基础的西方资产阶级国际主义;后冷战时期的北方国家面对来自南方的“异教徒”的恐怖主义全面袭扰,团结的基础是捍卫欧美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北方“后现代文明认同主义。”

从历史来看,当年的殖民战争是“文明民族”征服“野蛮民族”的战争;上世纪下半叶的冷战是西方遏制东方的斗争;而后冷战时期的反恐战争则是北方强行改造南方的战争,“用暴力方式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人,强迫边缘社会加入新的世界秩序”^[6]。在消除了东方对西方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挑战以后,北方与南方之间的文明差别就凸现出来。阻碍北方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彻底全球化的主要障碍就是南方国家,改造南方成为美国为首的北方迫不及待的战略目标,而南方国家中的伊斯兰国家首当其冲。小布什的“大中东民主计划”就是一个例证。此次的阿拉伯革命从北方角度来说也是这场改造运动的一部分,是西欧北美民主膨胀溢出的产物。20年前剧变的东欧位于西欧边界的东边,此次剧变的

北非则位于西欧海岸的南边。

从结果来看,按欧美民主的标准,上次东欧国家的民主基本“煮熟”了,独联体国家则“夹生”了;从此次中东民主运动发展的趋势来看,北方的目标是非“煮熟”世俗的阿拉伯国家不可,而对君主制亲美国家的民主则不得不让其“夹生”。由法国打头的北方国家积极武力干涉利比亚,而对海湾国家镇压民主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是例证。美欧在对待北非国家和海湾国家的问题上无疑继续采取了双重标准,沙特对巴林的出兵得到了美国的默许。“基于维护与海湾国家的盟友关系,遏制伊朗势力做大,稳定国际能源市场,防范伊斯兰激进势力借机崛起等目的,美欧尚没有彻底改变海湾君主制政权的决心。”^[5]现在,在北方的武力干涉和双重标准对待下,“阿拉伯之春”已经由“街头革命”,转变为“流血战争”。这再一次证明北方对南方的民主改造的属性仅仅用强迫来表述是不够的,更是必须用血腥来标志的。

美国为首的北方是当代战争的永动机。不用仔细统计就可以看出,后冷战时期北方发动的战争都是针对南方的战争,唯一的欧洲国家南斯拉夫还是南方国家的主要组织“不结盟运动”的发起国和首届会议的举办地,其含义不言而喻。美国为代表的北方依仗强大的经济、军事和传媒力量,将会赢得这场强制改造南方的斗争,但也将衰于这场斗争。

六、福兮祸兮,飞去来器

福兮祸兮,飞去来器。对美国与欧盟来说,中东风暴是民主价值观的胜利,但从利益观来看,鹿死谁手还不一定。当年的东欧剧变是戈尔巴乔夫的飞去来器,放手东欧的结果是最终打散了苏联自己。这次阿拉伯剧变是谁的飞去来器?在国际关系史上,对运动目标与结果的利益诉求上,还没有像这次呈现如此矛盾悖论的情况,伊朗断言说风暴是伊朗伊斯兰革命的继续,断言结局将是美国被赶出中东;美国和西方想借机推翻反美反以的伊朗与叙利亚联盟和剔除刺头卡扎菲;卡扎菲则大叫动乱是基地组织策划,他是在替欧美反恐;海湾国家则一方面结成“神圣同盟”出兵巴林镇压造反,一方面又积极支持欧美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出面调和也门朝野对立,提出武力干涉叙利亚局势的议案以转移视线躲避风暴蔓延自身并打压什叶派;以色列一方面对阿拉伯敌人的内乱偷着乐,一方面担心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上台恶化其生存环境。

利比亚乱局中,法国在促使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在利比亚建立禁飞区的决议和打击卡扎菲方面极为积极,安理会禁飞决议后,法国带头向利比亚发动空袭。法国是第一个外交承认利比亚反对派政权的国家,抢了美国的风头。法国如此迫不及待,第一原因是价值观,法国一贯以平等自由博爱的母国为自豪。在事关人权,民主这些西方“普世价值”问题上,法国从来是“当仁不让”。有时比美国和英国更“理想”和“激进”。第二原因是视马格里布地区为后院,马格里布大部分曾是法国的殖民地,法国视此为自己的后院。该地区的不稳直接关系法国的利益。作为马格里布边缘的利比亚局势,势必影响马格里布核心地区的未来局势。法国要确保马格里布剧变后法国的利益不受别的大国染指。第三原因是充当欧盟领袖和地中海联盟的盟主,法国和德国是欧盟的两大发动机。此次干预德国害怕连锁反应,不想动,美国困难缠身,也不想打头阵开第三个战场。而这正是法国显示欧盟领袖作用和世界大国地位的好时机。法国的长远战略还想变地中海为欧盟的后院和“拉丁内湖”。毕竟是在法国倡议下建立了地中海国家联盟。第四原因是欲除隐患卡扎菲而后快,卡扎菲长期以来在非洲地区到处插手,特别是对原法国势力范围的国家干涉插手,如乍得、中非,威胁法国非洲利益。法国军队曾在乍得等国家同利比亚军队直接交过手。这是一个可以让法国借机除去卡扎菲这个刺头好机会。第五原因是萨科奇的性格使然,萨科奇是一个爱作“秀”的政治家,在某种程度上不亚于卡扎菲。做事表现欲强,机会主义浓重。明年法国大选,政绩不怎么样的萨科奇想打外交牌获得政绩。看到利比亚反政府军节节挺进,判断卡扎菲大势已去,第一个外交承认了利比亚反对派的政权。原想抢个头彩,可惜“秀”得太早,当时不但没有欧美盟友跟进,而且卡扎菲反击得手,兵临班加西城下,大有将反对派一股脑扫荡的可能。这使得萨科奇坐立不安,既为利益,更为面子,也要出手。否则,如果让卡扎菲反败为胜,法国无疑将大丢其脸。现在随着卡扎菲的倒台,萨科奇的冒险投机看似胜利了,实际上埋下了新的隐患。现在,萨科奇又想在叙利亚问题上打头阵,进行新的冒险。

这次的飞去来器到底是伊朗的还是美国的?是萨科奇的还是阿盟的?是海湾石油君主们的还是以色列的?唯一可以肯定的,不论是谁的,都将是一场吃不了兜着走的梦魇。

七、国际连锁动乱 20 年周期

国际连锁动乱,是在一个相对紧凑的时间段内,像多米诺骨牌倒塌一样,从一个国家传向另一个国家的波浪前行的动乱。其表现特征是;有着的共同的外在“符号”,相像的内在诉求,类似的行动样式,接力式的骨牌倒塌,由点到面的地区卷入,改变格局和秩序模式的结果。其发生具有突然性,发展具有传染性,形式具有模仿性,波及具有连带性,结果具有颠覆性。

后冷战时期的 20 年,大约十年左右爆发一次虚拟经济危机。1990 年日本爆发泡沫经济危机;1998 年爆发亚洲对冲基金危机;2008 年爆发美国次贷危机。危机由点到面,由一个国家到一个地区,又发展到全世界。在全球化时代,危机也全球化了。

中东动乱作为连锁动乱还未结束,而发起于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又风靡美国和世界许多地区。希腊、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乃至英国,大罢工和游行示威接连不断。

政治性连锁性动荡仅以 20 世纪迄今来看,大约 20 年一次。1914—1918 年一次大战;1939—1945 年二次大战;1968 年以法国学潮为代表的席卷西方的“红五月”学潮和工潮之年;1989—1991 年东欧剧变、苏联解体;2011 年“阿拉伯之春风暴”;时间都是相隔 20 年左右。一般来说,一个动乱结束之后,会形成一个新的相对固定的体制,而这个生态的内部又会逐步形成和积累矛盾。从国际政治博弈来看,国际关系矛盾的积累 20 年左右达到爆发点,这也是历史波浪前行的特点反映,符合国际关系波动的规律。

历史从来就不会是线性发展的。后冷战时期的 20 年,是西方理论与制度“凯歌行进”的 20 年,在收获巨大红利的同时,也积累了太多的问题,其缺陷正在逐步暴露出来。西方政治学理论在国际关系与对外政策中的运用暴露了其损人利己的本质;以西方经济原教旨主义理论为基础的“华盛顿共识”在众多转型国家的引进和使用中造成了重大失误。20 年前的苏东社会主义体制的瓦解与欧美资本主义的稳定形成的强烈对比,使资本主义国家信心满满,自恋西方经济与社会制度的原则已经终结了历史;而全球化、一体化和高技术兴起带来的效益,冲淡了和掩盖了原本存在的问题。但是,当全球化与一体化的优势作用减弱时,资本主义的旧矛盾和全球化中积累的新问题一起迸发。

现实中的 21 世纪,与当初许多天真学者的憧憬和短视政客的预言大不一样。和平与安全问题上:世界大战虽然打不起来,但局部战争越打越多,越打越大,越打越长;经济与财政上:金融危机、债务危机,希腊动荡、叙利亚内战、西非政变、南北苏丹冲突接踵而至,爆发频仍;自然与生态上:自然灾害与新型疾病不断爆发,危害巨大。

进入第二个 10 年,国际形势复杂多变,金融危机、日本地震海啸与核污染、中东风暴、利比亚战乱、债务危机、挪威枪杀、英国骚乱、接踵而至。目前,自然生态和人类社会面临双重动荡的临界,经济、政治、自然三重危机使世界的不确定因素日益增多,如何应对和治理国际社会的“三危”现象,是当代国际关系极为紧迫的课题。

八、世界进入新一轮的解构和建构时期

历史证明,每一次重大的经济危机,都为某种政治上的重大转变提供了平台,只不过这种政治变化会比经济危机滞后一段时间。1929 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五年不到德国法西斯上台,危机 10 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1971 年世界经济危机直接导致布雷顿森林体制垮台,苏联开始战略进攻,美国战略收缩;1990 年泡沫经济危机的结果,使日本成为世界一极并牵制美国的可能性化为泡影;世界 1998 亚洲经济危机后,东南亚多国出现动荡,“四小龙”从此结束高速增长期。2008 年金融危机在强大的救市措施和国际合作下虽然较快地缓解了,但引发危机的根本问题并未解决。现在,欧美债务危机再次爆发,引发对世界经济“二次探底”的忧虑。所以,2008 年经济危机的负面影响不可能在短期内消除,这些后遗症将会加剧世界政治与社会矛盾的激化。

以百年规模的经济危机和中东动乱为契机,历史获得了一个新的拐点。在两场战争和一场经济危机的压力下的美国,不得不实行战略收缩,利用美国集中于自身事务,一些力量将会相机采取行动,实现原本在美国压力和制衡下未能实现的目标,一些在美国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操控的国际秩序下被掩盖的矛盾和不满,将会喷发出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此次中东动荡,也是美国主导的冷战后中东秩序走向失控的表现。

20 年前的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颠覆了世界格局,20 年后的中东风暴和债务危机将会瓦解“神马东西”?世界正逐步进入新一轮的解构和建构时期,冷和平局面将会逐步破局,热冷战生态可能会逐

步升级,对其可能带来的变数应有所警惕。中国外交正处于从“和平”向“和谐”深化的新出发点,面对信息化与全球化的新型国际危机局面,中国的国际战略与外交政策必须具有更大的前瞻性,才能完成为中国和平新兴与实现和谐世界目标保驾护航的任务。

(参考文献)

- [1]黄培昭,裴广江,石清风,贾健等. 中东为低龄化伤脑筋 [N]. 环球时报,2001-03-07(07).
- [2]秦天. 突尼斯“茉莉花革命”的前因后果 [J]. 国际资料信息,2011.

- [3]阴森,陈明,刘洋,汪析等. 非洲是否迎来大动荡期 [N]. 环球时报,2001-04-20(16).
- [4]看清中东动荡“不是什么” [EB/OL]. http://www.anhuinews.com/zhuyeguanli/system/2011/05/31/004096085_01.shtml.
- [5]刘中民. 政治合法性危机是中东动荡的根源 [EB/OL]. <http://www.dfdaily.com/html/51/2011/4/19/594509.shtml>.
- [6]胡安·迭戈加西亚. 西方世界在第三世界进行“新殖民战争” [N]. 参考消息,2011-04-04(10).

(责任编辑 韩芳)

Drastic Changes in the Middle East and the Cycle of the International Chain Turbulent

YANG Mian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24)

Abstract: The death of Gaddafi marks the turmoil in Middle East has opened a new page. This Arab Spring was a rebel movement set off by the information cynical. Its propagation effects reflected that, in the unrest and rebel mobilized by means of information, the organizations were invisible, occurrences was instantaneous, the scale was enormous, the structure was flat, and the leadership was invisible. The challenge of the East to the West been eliminated, the main obstacles in the globalization of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ystems of developed countries came mainly from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modification of the South was the main strategic objectives of the countries of the North Group which took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uropean Union as the main body, and the Islamic countries in the countries of the South would be modified firstly. In the early 21st century,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was complex and volatile, the variables increased, natural ecosystem and human society faced a double unrest, economic, political and natural crises followed. In 20th century, the economic chain of turmoil happened once a decade, the political chain of turmoil happened every 20 years. The world would gradually enter the period of the new round of deconstruction and construction, the cold peace situation would be broken, and the hot Cold War would upgrade gradually.

Key words: Middle East Turmoil; Arab Spring; Cycle of international chain unrest; Cold peace; Hot Cold War